

《對0371運動影響存疑》

評論：葉寶琳（標題為編輯所加）

李達寧的這篇文章當中所提到的一個重要性時刻是零三年，當時是香港人從「經濟人」的狀態轉化為「政治人」的狀態的一個重要分水嶺。李達寧以行山遠足作例子，指出當時的香港人開始意識到人與自然之間的相互關係，亦開始把政治帶進生活之中。除了以行山遠足比喻整個香港狀態以外，我另外發現，文章中有兩點十分重要。第一就是2003年這一個年份，其實意味著一個社會向上流動的神話的破滅，例如香港社會過去數十年一直在流傳的李嘉誠的神話一樣。李嘉誠白手興家的故事就如神話一樣，但事實上在二零零三年這一個社會流動的神話已經破滅。

在這一點上，我的印象是相當深刻的。因為二零零三年本人正剛從香港的殖民地大學——香港大學的社工系剛畢業。那一年對社福界也是十分重要的一個時刻，但其後我發現這一重要時刻其實不僅限於社福界，對於許多界別也是十分重要的一年。為何重要呢，因為在零零及零一年度期間，政府通過了一筆過撥款這一項政策，亦正是在我畢業的那一年正式實行這一刻措施。縱然當時社會充斥著不少反對聲音，但這政策所帶來的負面效果其實並未有即時展現出來，卻是在往後幾年才慢慢的展然出來。

另外在2003年出現的另一重要事件，就是副學士——一個教育商品化的情況出

現。副學士都是在2000至2001年年度出現的，也是董建華在任內推行的政策之一。此外第三件事就是「孫九招」。「孫九招」是一項十分重要的政策建議，當中比較重要的便包括了譬如停售居屋及撤銷租管等政策。其實也由於這些政策造就了地產霸權能控制香港的整個供應。亦由於這個轉向讓新自由主義成功被引入香港。而這種政策所帶來的負面後果從2003年開始逐漸明顯。

李達寧在他的文章中所提到的香港普羅大眾在2003年以前，一直都是以一種經濟人的狀態為主。經濟人這一種身份狀態的確立其實是因為過去香港的民主自由的發展一直都是以一種由上而下的模式存在。這不單只限於麥理浩年代，當中也包括後來的彭定康年代。文中並未有提到彭定康，但我也把彭定康年代包括在這一次討論之中。因為彭定康的重要性在於，他提出的政改方案，不論是在八五年之後，或是八九年之後，都是以一種由上而下的政策設計模式推行。在這一過程之中，群眾並未有透過自身參與——以一種由下而上的方式推動香港民主自由的改變。

這種狀態形成香港經濟人狀態的發展。香港人相信，自己可以靠雙手白手興家，而民主自由等則是由上而下的方式安排。香港人並未有經歷由自己一手一腳爭取民主自由及推動改變。群眾運動中能勉強稱得上政治事件的就只有六七暴動，或者八十年代曾發生過的大型居民運動。但是這些運動與政治的連結都是比較少的。例如油麻地艇戶事件、天台屋等議題，又或是公屋富戶政策等抗爭運動，也是相對少與殖民地政府及政治性等問題連結起來。因此李達寧在文章中，以03年作為一個由經濟人轉化成政治人的狀態的分水嶺，也是在這分水嶺中，見到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經

濟惡果。我認為，這一惡果其實是基於剛才所描述的因為經濟大環境的轉變所導致的一種惡果。從李的文章中可以見到，他有相當大的勇氣，他對這一大經濟發展作出了詳細描述。我說他有勇氣是因為依我經驗所見，許多寫文章的朋友都未至於膽敢為這一大經濟作出這樣的一個判斷。但是李達寧卻在文章中對香港發展作出了這樣的一個詳細描述。

但是對我而言，我並不認為生活政治的展開是在03年。希望李達寧待會也可對我這一個觀點作出回應。對我而言，相比03年，我更認為08年反高鐵運動才是真正在生活政治、人與自然及土地之間的關係發展上有一突破。我希望在這一個觀察上多聽一點李達寧的看法。但是，即使我覺得08年才是突破，03年仍然是一個十分有意思、值得引申下去的一個討論。例如「七一回歸十週年」，這三組詞語本身已經十分值得討論。例如談及回歸，好多時候好多人都沒有留意，我亦儘量避免，就是當討論回歸，有九成九都是指涉主權移交。因此大家都儘量避免談及回歸這一字眼。但是，相反來說，十週年這一字眼，卻似乎依據馬國明馬老闆所說，是把那一套官方的那一種要解決百年屈辱的官方意義，轉化成屬於香港人一套的本土化意義。

首先需要重提一點，其實七一遊行並不是自03年才開始有。03年以前，每一年七一其實也有示威，每一年也有遊行。但依我的記憶所及，在03年以前的遊行當中，更有一、兩年的遊行主題與主權移交完全無關，卻是關於六四的。其中更有一年的七一遊行是以平反六四為主題。那是直至03年以後的七一遊行才開始有另一套意義出現。當然，在當時的遊行主題上，仍然十分抽空，人民也是十分抽空的概念。直至

現在十週年，不論是指涉中產階級也好，又或是公民社會的發展也好，其實這些指稱都是不斷地被重新賦予另一種意義。

但是對於我來說，作為一個具有前線運動經驗的人而言，03年的運動發展到底意味著什麼意義呢？我認為，其實我們是沒有必要去把公民社會浪漫化的。正如當年，當時我剛從大學畢業了一、兩年，0371的時候我才幫遊行當糾察，在曬太陽，當時我留意到，其實每一個界別，他們會各自在不同的地方集合，然後又與71的遊行大隊伍一齊遊行，然後又會舉辦不同的記者會以表明不同界別對23條立法的反對立場等等。而我疑問的是，這一種「百花齊放的」狀態，在遊行完以後是否能延續下去並因此壯大了整個「運動」組織？當中的不同小團體，又是否能夠或有多少能在03年71以後，成功地延續下去？

在傳統公民社會發展上，我對0371的影響始終是存有疑問的。但我發現，能成功發展出實際意義的卻是在網絡政治上，尤其是04年名嘴封咪事件之後。正如馬老闆有提到的，尤其是在主流傳媒的闡釋之上。對於我來說，0371所帶來的最重大的意義就是在當時遊行之前，多了許多人自發地在利用網絡媒體去組織並發起一些行動。我們發現，現在許多行動的發起都不再需要倚靠主辦單位的力量。許多人只是憑自己的力量，用自己方法都能做到。當時還未有什麼社交媒體，但是不知大家還有沒有印象，例如網政21，或者sosick.org等網上組織出現。例如sosick.org就是一個由三位大學生自發建立的網站，他們收集了沙士疫症大廈資料後，再把這些資料放到網上，以回應當時政府始終不會把疫症大廈名單公佈予公眾的做法。在這三個學生自

發建立這個網站的一個月後，政府終於接管了這一個任務，開始肯去公佈有沙士疫症的大廈名單。網政21則是透過Outlook Express來去瀏覽pps。但是始終sosick.org就正是一個自發地、自行透過網絡媒體來發展的一個網絡政治的好例子。除此之外，在當年名嘴封咪之後，不論是網台還是In-media，都是03、04年網絡政治發展的一個延續。

另一方面，對於傳統公民社會的團體發展來說，0371之後，是怎樣的抗爭精神得以被延續呢？又或者我們延續了一些怎樣的組織力量呢？面對今天，例如去年的反國教，我覺得我們是時候也有必要好好反思一下，我們到底有哪些方面進步了？例如在行動的動員力上，我們似乎是增強了；但是組織能力又是否有所增強？反觀我們現時的組織力，似乎和以往相比還是差不多。因為這個狀態，我們好多時候都會傾向依賴主流及網絡媒體作動員渠道。當然，現在當主流媒體的記者都是通過Facebook「收料（取材）」時，我們又有必要問一個問題，就是現在通過網絡，通過社交媒體平台，到底我們的位置是主動了？還是變得被動了？

正如在剛才的討論中就有提到，0371對於官方而言，是主流媒體幫市民創造了歷史，但其實只是迫使北京更加控制香港。這些都是最近一、兩年我不斷思考的問題。尤其雙非問題，其實我們都很明白，雙非問題是因為03年CEPA而引發出一個問題。但這又是否代表我們要去否定0371運動所帶來並延續下來的抗爭精神？所以問題應是剛才所提及過的，人民到底是什麼？我們需要思考的是，空的人民意義到底是在召喚，還是令我們更加困難地去收割呢？收割的意思是當0371或人民，這

些講法我們沒有賦予它們意義及內涵的時候，那麼那收割的成果就只會變成「北京僭越董建華」作為我們運動的成果。但是這一成果又是否是所謂人民所希望達致的一個目標呢？又譬如，我們去討論基層問題，其實基層市民又是否希望董建華下台呢？可能事實未必如此。

所以，我們更要問的是，假使在十年後我們再去對照反國教運動時，在討論之中所談及的抗爭精神，其實是否會與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有所什麼不同？例如中產階級的描述，就本人而言，現在的抗爭與 0371 時的相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本文根據2013年6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